

档案馆学新探

DANG AN GUAN XUE XIN TAN

何 振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序(一)

今年中秋,何振两件喜事登门。一件是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一件是他的新作《档案馆学新探》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写成并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读完何振的《档案馆学新探》,启迪颇多,受益匪浅。

首先,这本书是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据现有材料考证表明,在国外,档案馆学与档案学的产生、发展具有同步性,从16世纪起,冯·拉明根、巴尔塔萨、波尼法西奥、乔治、艾伯林、郎格鲁等学者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档案馆问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而在我国,对档案馆和档案馆学的系统研究,比起档案学的研究,起步要晚。20世纪50、60年代,曾经有过一些零星、片断的调查研究,真正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还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档案馆和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培清、韩伟之、郑玉豪、金琦、施宣岑、王景高、张晓娟、姜之茂、薛匡勇等人的专著,为档案馆和档案馆学的研究不断地增添了新的内容。何振这本书就是在国内外这些前辈、同仁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踩着巨人的肩膀”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其次,这本书不仅仅在于继承,而且重点在于发展和创新,故而曰“新探”。求实创新,不落俗套,是本书的主要特色。“新”在何处呢?初步阅读觉得在以下方面比较富有新意:档案馆学的性质与方法论;关于档案馆性质、地位、要素、矛盾、功能、环境等方面的分析;档案馆类型重组与网络布局;未来档案馆工作的发展趋势;

档案馆工作现代化建设以及数字档案馆的构建;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模式;档案馆决策、控制以及人员管理等方面,写出了个人比较新颖的看法,许多观点论述较为精辟,具有一定的创见性和前瞻性,读过之后启发较大。比如,《新探》在分析档案馆矛盾时,提出馆藏档案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与用户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档案馆工作的主要矛盾,档案信息资源的有限性是主要矛盾方面,同一般概念上的基础工作与利用工作之间的矛盾是档案馆工作的主要矛盾,利用工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观点相比较,在理论上深化了一步。又如,《新探》在分析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模式时,提出了传统化模式、经济化模式与信息化模式的区分与归类,较之历来的笼统提法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此外,《新探》对于档案馆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专题论述,重点突出,不落俗套。比如,档案馆学研究对象、档案馆基础业务工作、档案信息的全过程管理以及档案馆组织、领导及其经费、设施设备管理等方面,避轻就重,主题突出,较少重复别人的观点,所以也给人以新意之感。

最后,这本书也还有些不足之处,即偏重于对国家档案馆、综合性档案馆等方面的论述,而对于专门性档案馆、地方性档案馆、非国家档案馆等方面的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与对策,这恐怕也是我们整个档案界 21 世纪中必须予以关注的新课题之一。也希望作者能把此类问题作为今后追踪与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以使档案馆学建设更加成熟。

总之,“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档案馆学新探》是何振于中秋节之际送给我的最好的丰收礼物。仅以此序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陈智为

2002 年中秋节于中国人民大学
宜园五楼福安居

序(二)

何振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中华传统精神,撰写了《档案馆学新探》一书,今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情。我作为何振的老同事、一个年近古稀的“兰台”战士,为能读到《新探》这部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重要书稿而感到十分欣喜,同时也为作者在这方面付出的艰辛表示敬意。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包含着档案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档案馆机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在这方面,我们与法国18世纪末率先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就曾建立起近代国家档案馆以取代封建社会形成的机关档案馆相比,至少晚了170年。由于档案馆建设落后,有关档案馆理论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档案馆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档案馆建设更是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档案馆覆盖着整个中华大地的各行各业,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科技文化事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暴露出了一些制约档案馆事业持续发展的问題。

如何总结与借鉴国际国内有关档案馆建设方面的经验?如何吸取档案工作方面的某些教训?如何面向挑战、认识新形势下的档案馆事业?如何加强档案馆学的研究、用现代科学理论促进档案馆工作的持续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正确回答,都必须找到正确答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湘潭大学李培清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出版了档案馆学专著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进入90年代后,一

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毫不示弱,他们以“前江后浪推前浪”的勇敢精神,对档案馆学寻根究底,锲而不舍。在湘潭大学从事档案教学与科研的何振就是其中一个。

何振毕业于云南大学档案学系,到湘潭大学任教后,在担负繁重的科研与教学任务的同时,坚持在湘潭大学经济学院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由于教学与科研成绩突出,在取得讲师任职资格后的三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现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新探》一书就是他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的重要一项,也是他近几年深入调查研究、潜心探索档案馆学取得的系列佳作总汇。

读罢《新探》,觉得她的特色在于:

第一,思想活跃,锐意开拓。比如,对我国档案学和档案馆学起步晚、缺陷多、科研队伍小、视野窄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被贬为冷门学科等现象,《新探》一开篇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直言快语,疾呼危机,正是为了解决或摆脱危机,虽使读者感到有点“辣味”,但当你读完关于“危机”论述之后,却会觉得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第二,体系完整,思路清晰。全书分为档案馆学科、档案馆机构、档案馆工作三大部分,无论是“文件—档案—档案馆—档案馆工作—档案馆学”,还是“档案馆工作的产生发展—档案馆业务建设(档案馆实体管理与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馆行政管理(档案馆组织领导和档案馆后勤事务管理)”,都形成了一种链条关系,层层推进,不断深入,让人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

第三,“主体”突出,旁征博引。《新探》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自己论述的“主体”或重点,大都奠基于一相应的原始资料的引证、分析之上,避免了主观、武断的流弊。比如,对于档案馆工作在档案事业中的地位与功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主体”与非“主体”之说,《新探》通过深入分析论证,充分肯定了档案馆在储存与传播文

化遗产方面的主体地位、主体功能。

第四,纵向溯源,横贯中西。比如,《新探》在谈到现代档案馆的分类时,为解决条块分割的现象,主张将现有的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的划分模式,改用公共档案馆和非公共档案馆两种基本类型,然后在公共档案馆类再分层次,注重档案资源的网络化,分工合作,加强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人力资源、档案设备资源等方面的合理配置与共享,无疑是一种有效协调档案馆体系内部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西方国家档案馆模式的借鉴。

第五,求实创新,放眼未来。《新探》在全面分析、论述档案馆各项现实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档案馆工作应当是用户中心化、服务优质化、实体虚拟化、功能多样化、业务协作馆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提出应当形成社区文化休闲中心和地区综合信息中心。此外,对数字档案馆的构建、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的模式、档案馆组织领导和人员、经费、设备管理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总之,档案馆工作在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一般都能在《新探》中找到作者所探讨的答案。

浏览《新探》,感受颇多,收获很大,但愿作者沿着已有的思路,继续攀登,不断深化,争取将档案馆学这门“主体”学科推向一个更高、更宽阔的境界。

黄子林

2002年10月5日于长沙

前 言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遗传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时代都建有珍藏并传播这些遗产的馆库——档案馆。周朝的天府,两汉的兰台、石渠阁、东观,南北朝的籍库,隋唐的史馆、甲库,宋元的架阁库,明清的黄册库、皇史宬、内阁大库,民国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等,充分展示了我国档案馆的悠久历史,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留下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同档案馆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切,为档案馆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档案工作,建立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馆,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了国家规模的档案馆体系;档案馆事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为促进档案馆事业更大发展和档案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的需要,一些档案学者相继研究出版了以档案馆工作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论文或著作,但总体来说这方面著作仍是少见。

诚然,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这是无可非议的。由实践本身特点所决定,档案馆工作实践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反应远比档案馆学理论的反应更为迅速。因此,我们不能依照原有的理论来修改档案馆工作实践,而应该依照活生生的档案馆工作现实来发展完善档案馆学理论体系。

循着这个思路,再加上多年来讲授《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的亲身体会,1997年起就开始着手从事档案馆与档案馆工作

的专门研究,一直希望能在此方面有所收获。我跟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的“三驾马车”李培清、黄子林、王光宇等老前辈交流了这个想法,他们给予了我不少鼓励。1999年10月,又蒙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曹喜琛教授不吝赐教,让我有了自信。2000年8月,中国档案学会在吉林长白山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王德俊先生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一些青年学者,也给了我莫大鼓舞,这同样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老一辈档案学者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同时,我为自己的绵薄之力更加感到愧疚。

基于以上原因,我在成功申请并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9~2001年立项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档案馆工作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批准号:99054A)之后,作了力所能及的潜心研究。本课题组至今已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档案馆学新探》即主要以这些论文为基础形成的课题最终研究成果。

2001年起,特别是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考试期间,有幸得到王传宇、陈智为、冯惠玲、郭莉珠、周雪恒、张辑哲等老师的指点、惠正,使我更加坚定了出版这部书的决心。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旨在立足于21世纪的档案馆工作改革开放,注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求实创新,大胆突破,并力求理论研究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对新世纪的档案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是我的誓求。但是,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发现档案馆工作不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明显感到自己能力有限、精力有限,原来计划2001年完成研究任务,结果等到2002年8月才草草收笔。显然,书中存在不少纰漏之处。尽管如此,我为自己的努力仍然感到欣慰,毕竟有了一次尝试。

《档案馆学新探》一书终于写成并出版,在此我首先谨向曹喜琛教授表示深切的怀念,同时向王传宇、陈智为、冯惠玲、郭莉珠、周雪恒、王德俊、赵国俊、张辑哲、李培清、黄子林、王光宇等专家致

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陈智为和湘潭大学管理学院黄子林两位恩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这无疑是对我的厚爱和鼓励,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赵国俊教授对本书也提出了不少的指导性意见,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对本人的研究也给予了很多关怀,这都是我要由衷感激的。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大量文献,有的直接作了注释,有的附在书后“主要参考文献”栏中,在此,也向所有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本书撰写的还有我的同事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刘琴副教授和湘潭大学图书馆张冬梅馆员,她们参与了第九章的撰写。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的唐跃进、肖文建、杨利华、王协舟、陈艳红、徐拥军、仇壮丽、唐艳芳、马克义、向立文、唐思慧等同志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也给予了不少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获得了“湘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省外有关院校的专家和湘潭大学学术委员会先后对本书进行了辛勤的评审,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湘潭大学科研处和中国档案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不少帮助;此外,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傅华、侯卫珍、尚真、张建华、卫奕、吴晓红、杨鲁霞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向以上单位和同志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档案馆学新探》实际上是一项集体智慧的成果。当然,囿于研究水平,书中不足仍然难免,恳请读者批评雅正。

何 振

2002年10月10日于人大宜园



何振，男，湘潭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档案学系副主任。1969年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先后毕业于云南大学档案学系、湘潭大学经济学院，获历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师从姚先国教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研究。2002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攻读电子政务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赵国俊教授。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档案馆工作、政务信息管理。主要成果：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4部（含合著），主持和参与各种课题12项，负责教学管理项目3项，8项成果获部、省、市、校级奖励。曾被评为湘潭大学优秀班主任、优秀党员、优秀教师。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探讨档案馆学科、档案馆机构、档案馆工作三个方面。就档案馆学科而言，在分析档案（馆）学危机与契机的基础上，探讨了档案馆学的理论轨迹，进而对其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就档案馆机构而言，着重分析其性质、地位、要素、矛盾、功能、环境等，进而探讨了档案馆的类型重组与网络布局等问题。就档案馆工作而言，一方面分析档案馆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探讨其未来趋势；另一方面分析档案馆业务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主要探讨档案馆外在的实体管理和内在的信息管理，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及人员、经费与设施设备管理等，重点对这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针对档案馆工作现状的变化情况和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地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适合作为广大档案工作者、档案院系师生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参考用书。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前 言.....	(6)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何谓档案馆学	(21)
第一节 档案馆学研究对象论	(21)
第二节 档案馆学属性辨析	(33)
第三节 对档案馆学方法论的反思与创新	(37)
第三章 档案馆透析	(44)
第一节 档案馆性质与地位分析	(44)
第二节 档案馆要素与矛盾分析	(57)
第三节 档案馆功能分析	(68)
第四节 档案馆环境分析	(79)
第四章 档案馆类型重组与网络布局	(90)
第一节 档案馆的类型重组及其层次特点	(90)
第二节 档案馆网络布局	(97)
第三节 需要说明的几种档案馆.....	(107)
第五章 我国档案馆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114)
第一节 对我国档案馆工作产生与发展的回顾.....	(114)
第二节 未来档案馆工作的发展趋势.....	(129)
第三节 加快档案馆工作现代化建设的思考.....	(135)
第四节 数字档案馆建设.....	(142)
第六章 档案馆基础业务工作.....	(148)

第一节	档案馆的实体管理·····	(148)
第二节	关于加强馆藏建设的思考·····	(163)
第三节	电子时代全宗原则的回顾与深化·····	(172)
第四节	我国档案馆鉴定工作中的问题与反思·····	(179)
第七章	档案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86)
第一节	档案馆档案信息的全过程管理·····	(186)
第二节	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模式与措施·····	(197)
第三节	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效分析·····	(211)
第八章	档案馆组织领导工作·····	(220)
第一节	档案馆决策与计划管理·····	(220)
第二节	档案馆组织与机构设置·····	(228)
第三节	档案馆领导与领导体制·····	(237)
第四节	档案馆控制与目标管理·····	(246)
第九章	档案馆后勤事务管理工作·····	(254)
第一节	档案馆人员管理及其存在的问题与措施·····	(254)
第二节	档案馆经费管理及其存在的问题与措施·····	(264)
第三节	档案馆建筑与设施设备管理及其思考·····	(275)
主要参考文献	·····	(283)
后记	·····	(287)

第一章 绪 论

一、我国档案学的危机管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档案学理论随着国家政策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更新,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体验和科研探索中,深深地体会到我国档案学仍旧处在改革的实践和原有理论的矛盾之中,其理论仍不能有效地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因此存在着危机。

(一) 档案学是当代冷门学科

冷门学科,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冷点的学说、学派。在通常情况下,冷门学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冷门学科同其它学科相比,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不仅受到群众的忽视,而且当权者也很少重视;从事冷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它学科小,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较少,学术活动不频繁,学术思想欠活跃;冷门学科的出版物同其它学科相比,覆盖面较窄,数量要少,规模也小得多;冷门学科的理论群众掌握的不多,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说档案学是冷门学科,有以下根据:档案学学者在全国学者队伍中占的比重很小;档案学刊物在所有学术刊物总量中占的比重很小;档案学著作出版量占整个出版量的比重很小;档案学科的文献量在社会科学文献总量中占的比重很小;全国高校在校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中,学档案学的人数占的比重很小,有硕士、博士授予权的档案学院、系在全国的比重很小;档案学对社会生活中的干预广度和深度较弱,档案学对决策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很不明显。

档案学的地位不高,将会隐藏或引发一些问题:

1. 档案学进入权力中枢,不为掌权者重视,将出现决策部门或歧视真理,或偏离真理,或滥用真理的现象。从而导致决策不均,工作失调。

2. 档案学进入社会各界中,受到群众偏见,就会产生一种舆论误导,致使其他人对真理不屑一顾,甚至颠倒黑白,谈档色变。

3. 档案学进入社会科学建设中,就有一个如何处理热门和冷门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冷门就有可能受到热门的压制甚至被代替,致使科学缺乏全面。

4. 档案学进入实际工作,就有一个是否开展档案工作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档案就可能被搁置一边,甚至受到任意“宰割”,档案工作则名存实亡。

出现了上述问题,档案学便不能承担本应由它承担的任务,而导致整个社会工作系统失去平衡。

(二)我国档案学先天不足

据现有材料表明,中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935年)和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6年),到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1938年)和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1940年)等相继问世,标志着我国档案学业已产生。但是从其产生来看,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我国档案学萌芽于文书工作的研究,以机关档案室工作为研究范围,档案工作被当作一种机械工作来对待。秦翰才在其《档案科学管理法》中曾明确提到:“吾国档案工作殆从未有一个相当组织,即从未安置于一个重要地位。……在如此情形之下,档案工作仅视为文书工作之尾声。……”

2. 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存在纯技术的观点,停留在一些技术方法问题的研究上。殷钟麒在其《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说:“一般改革档案管理者,大都舍行政而言技术,盖以技术为本,行政为末。

而且对档案馆网的建立和档案馆工作的建设、档案文件的编纂与公布、档案文件的保管技术、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等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几乎还是空白。

3. 我国档案学的内容受西方国家档案学的影响比较深刻,特别是作为当时档案学的核心——分类,受欧美各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更为深刻。周连宽的著作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档案新分类法大概可分为二类:(一)仿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二)仿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档案学的重建和发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批判吸收建国前档案学的历史遗产、研究建国后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开始的。从其发展来看,我国档案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我国档案学界的队伍规模小,主要队伍还是从史学界、行政界调剂过来的。而且 20 世纪 50~70 年代,我国档案学教学队伍仅仅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一家。由于学者队伍小,人手不够,且大部分是外行出身,故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拓宽自然受到限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因而不够突出。

2. 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和创建新档案学的过程中,特别是 1955 年以前,曾一度出现了教条主义现象。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创立初期,主要是以谢列兹聂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讲授档案学知识,中国教员在其指导下只负责课堂讨论和实验课。^① 这对我国档案学的迅速发展虽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教条主义的出现。其主要表现是忽视实际,脱离实践,生搬硬套,机械搬用。

3. 我国档案学在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其教学科研队伍曾出现过近亲繁殖现象。比如,从 1952 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学

①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校友录》,中国人民档案学院 1997 年印刷,第 2 页。

科研队伍大部分都来自其历届档案专修科、研究生班、本科班的留校学生。当然,这是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对当时档案专业教育人才的补充及其巩固,对档案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正是这些先天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引发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我国档案学理论现状窘迫

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不能制止与其有关的偏离真理的现象,或者它的理论不能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或者在实践面前原有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破绽而又没有新的理论取而代之,我们就可以说,这门学科出现了危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档案学从“文革”时期的停滞走向复苏,并面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挑战。我国档案学在改革的实践和原有的理论之间痛苦挣扎,相当多的学者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脱离现实,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仓促地急转弯。

于是,大胆地突破档案学原有理论体系的种种约束,对档案工作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解释,力求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成为近20年来我国档案学者中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曾三、裴桐、吴宝康等为代表的老档案学者,对“文革”以来的档案学思想拨乱反正,为改革作了实践探索和舆论准备。继其后有曹喜琛、王传宇、陈智为、王德俊、周雪恒等为数更多的档案学家面向改革实践,进一步突破原有档案学体系的束缚,使档案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殿堂,档案学教育和档案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得到广泛普及。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者中涌现出一大批新秀登上学术舞台,他们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立场上,以新的理论视野,从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为中国档案学引进了一些新范畴和方法,给中国档案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为档案工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